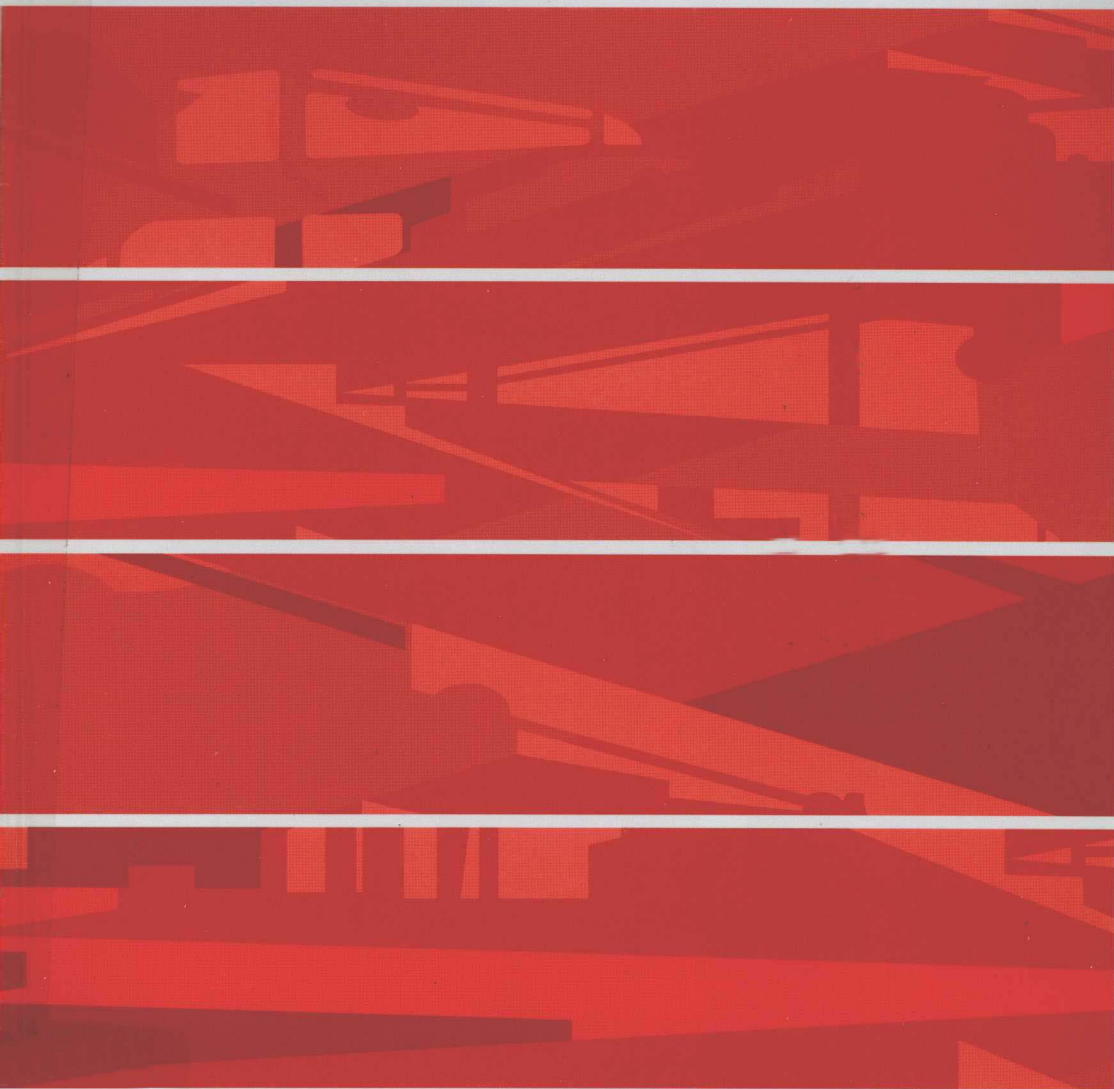


·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

ANGELA MCROBBIE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 / 著
张岩冰 彭 薇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 主编：马驰〉

NUXING ZHUYI YU QINGNIAN WENHUA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 著

张岩冰 彭 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开封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6—2010—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张岩冰,彭薇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649-0360-2

I. 女… II. ①默…②张…③彭… III. ①青年—文化—研究—英国 IV. ①D756.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868 号

书 名 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

著作责任者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 著 张岩冰 彭 薇 译

责任编辑 纪庆芳

责任校对 辛 媛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诚和印制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mm×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全部或部分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Angela McRobbie 1991, 2000
with the exception of Chapter 1 ©Angela McRobbie and Jenny Garber;
Chapter 6 © Simon Frith and Angela McRobbie 1978, 2000; and Chapter 8
©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copy or transmiss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No paragraph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save with written permission 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or under the terms of any licence
permitting limi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0LP.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s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liable to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ivil claims for damages.

The authors have asserted their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s of this
work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Published by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RG21 6XS
and London
Companies and representativ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irst edition 1991
Reprinted five times
Second edition 2000

ISBN 0-333-77031-5 hardcover
ISBN 0-333-77032-3 paperback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本书中文版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社授予河南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发行。版权所有，不得复制。

致 谢

作者及出版者在此谨向《英国社会学杂志》、《女性主义评论》及《银屏教育》致谢,感谢它们允许再版本书的三个章节。尽管我们已经尽一己之所能与版权持有人取得了联系,唯恐百密一疏。如有上述情况,出版者定会第一时间作出恰当处理。

探询和研究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

——写在《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付梓之际

如果我们对 20 世纪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做一个“盘点”，不难看出，其最有贡献的研究领域当属文化理论；同样，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文化理论。因此《国外文化理论研究丛书》首先把目光投向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并以译介和研究上述理论为本丛书的首要目的，这是因为，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把目光投注到现实社会，试图用马克思的原理和当代伟大的思想成果，去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的理论结构中，既有马克思的原理部分，又有当代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还有面向现实的维度。这种理论结构与我国新时期的理论走向非常一致。新时期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指导下，在对西方当代思想的合理吸收、对中国传统文论精华的再度发掘等综合因素的整合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正是由于有上述相同或相似的境遇、动力因素和理论结构因素，中国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在热点问题的提出、争论的发生、某些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等方面，都与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的文化理论有似曾相识之处。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抱着完全否定的观念研究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前那种纯粹批判的态度，也转变成在

了解、交流和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汹涌澎湃的商品大潮,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大众文化、商品文化的平庸性,精神价值的失落,引起了不少理论工作者的忧虑,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应运而生。有些人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处境与心态似乎和西方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模一样,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他们放眼国内外,都感到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压迫正在进逼。于是,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抗拒和批判的张力与武器。不过,此时理论界的动力与武库并非仅此一个,后现代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某些原则和理论上有根本差异,但这两种思潮在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交叠重合处也很多,在我国,理论界几乎是同时在使用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器,而并未感到有重大的区分和不便。在中国的知识界,对现代化导向最坚定和最彻底的批判者往往是这样的两位一体:他们心仪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拥抱后现代主义,这就是我国理论界的现状,这也就是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的意义所在。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工人革命运动低潮的产物,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西方社会自觉的或被迫的自我调适、自我变革,西方各国大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身处这种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和社会变革家,再去发展一种经济危机及其爆发的理论,再去制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既无紧迫性,也无实际意义。但是,现代化社会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毫无问题,从马克思的原始出发点——即人的解放,消除异化,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看,现代发达社会中的人一方面得到了物质享受,另一方面却在人性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从主观上想坚守初衷不变,还是客观上形势使然,走上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道路,并以他们的深刻和执着,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作为一种(在否定的辩证法这种意义上的)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病理诊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基本精神是相契合的。

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20世纪国外左翼学者所倡导的文化理论毕竟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本身是对马克思主义

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建构。本丛书通过对国外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辨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原点问题展开富有新意的研究,这对我国学术界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作为整套丛书,既有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有国内学者的研究心得;既有译著,也有专著;所涉猎的研究领域包括文化身份、社会心理、大众传媒、互联网、广告、青年与妇女问题等热点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但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引发了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乃至社会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汹涌而来的商品潮,大大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批判意识。终于有人领悟到了,时代的前进使人面临着一种问题转换: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止于抨击守旧意识,为改革鼓与呼,而且要从价值层面对现代化的方向、后果或伴随现象加以监督,做社会公正的发言人、精神和文化的守护者。由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它的批判理论必然成为人们寻求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解放的思想武器。因此,西方新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文化,乃至哲学、社会思潮的层面,而迈向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我们有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必要,这也是编辑本丛书的初衷。

愿这套丛书为国内学术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导 言

一段中西部的回忆

本书发表的所有文章,除了最后两章外,均完成于1974至1984年间,这10年我住在伯明翰。15年后回视这些文章,伯明翰这座城市自身以及东到考文垂、北至沃尔夫汉普顿的延伸开的环形公路,种种影像浮现心头。确实,每篇文章都开启了一个独特的空间,或者一条独特的道路。我并不希望如此,它却可能含义丰富。在写作这些文章的时候,选择某个地区都是很偶然的。伯明翰只是我从格拉斯哥搬过来做研究生课题的地方。我想要利用的文化研究的研究框架,至1974年,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这一框架当时渴望去描述和分析的,是社会阶级的某种真相,此后这一模式又被认为超越了地域和种族特性。

实际上是一种惯例,在研究中需要多多少少地掩盖街道、学校、青年俱乐部、夜总会和酒吧的特点,它们提供了我所关注的事件和活动的背景。伯明翰仅仅是我居住的城市。在绿树成荫的中产阶级居住的艾德格贝斯顿(Edgbaston)地区建有大学,两条主干道珀肖尔(Pershore)路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路通向市镇。在它们中间是塞

利橡树(Selly Oak)区和塞利公园,我们就在那里买了我们的第一所房子。几里外就是莫斯利(Moseley)和金斯希思(Kings Heath),是那些波西米亚的学生和学者群体居住的地方。这片地区后面是博尔塞尔(Balsall)荒地和斯巴克希尔(Sparkhill),是城市里爱尔兰人和亚洲人的主要聚居区,那里还有一些像我这样对即兴音乐表演(emergent music scenes)感兴趣的人经常去的酒吧和俱乐部。

博尔塞尔荒地的周边和城市另一端的汉兹沃斯(Handsworth)地区如此吸引人的一个原因,是城市的中心地区都是地下道和人行道。中心地区冷漠的市民自治制(Civic municipalism),具有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由一个团结的劳工市议会监督的具体城市规划的所有特点。白天我通过图书馆、艺术画廊,还有少数几家我已经想不起名字的服装店,以及宝拉德(Broad)街沿路的旧货市场和二手商品回收店来认识这个城市,而到了晚上,这从来不是一个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地方。它只是夜里我去俱乐部或者送朋友回家时开车经过的一系列环形路。它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汽车和环形路的城市。

虽然那时的政治工作和知识分子的研究都一边倒地关注阶级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中,中西部地区的工人阶级并不像在格拉斯哥甚至伦敦那样鲜明地出现。的确,这类人似乎被密封起来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的生活世界之间几乎或者根本没有一般这种规模的城市里都会有的重叠的部分。我不打算回想在格拉斯哥的酒吧中无法避开的男女工人与左翼学生学者之间的激烈讨论。我也不记得伯明翰是否像其他大城市那样,产生过自己的工人阶级诗人和作家。相应的,那些吸引有抱负的学者的机制,比如我自己打算写作工人阶级女孩群体,有某种程度人为的痕迹。

对于我在伯明翰工作的两个同事来说,可能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伍尔夫汉普顿长大,他现在也住在那里做关于学校里工人阶级男孩的民族志研究。多萝茜·霍布森(Dorothy Hobson)在她对工人阶级妇女通过看电视来认同自己的经历的研究中,描述了她和调查对象很相近的心情(Willis, 1978; Hob-

son,1980)。与他们相反,我仅有的在比较自然的场景中遇到的工人阶级的年轻女性,是几个强烈地想要挣脱她们的阶级背景的束缚,从而和周围格格不入的女孩子。后来发生的事情是,朋克和雷鬼音乐亚文化提供了摆脱阶级束缚的渠道。那三个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处在由另一个左翼反种族主义政治、艺术、文化实践理论以及硬毒品和音乐(后来给她们的影响更多)组成的难以想象的世界,她们被愤怒驱使,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伯明翰居住的十年中,我遇到的其他年轻女孩是住在我第一所房子周围的白人女孩。她们16岁尚未毕业时、或者毕业后很短的时间就怀孕了,人人如此,毫无例外。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纽带,因为我也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但是当她们的男朋友和孩子的父亲加入了种族主义政党英国国家党后,我们的关系很快受到了影响(参见第7章)。

所以在真实的意义上,阶级仍然只是头脑中的一个概念,只在理论层面得到应用,而我们周围更直接地感受到的、正在发生的政治,出人意料地是种族的政治、年轻人的政治,当然还有性的政治。在缪尔黑德大厦(Muirhead Tower,伯明翰大学主校区内的一幢综合教学楼——译者注)的讨论班中,人们面对的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与种族、年轻人、性研究之间爆炸性的碰撞,使得伯明翰学派在那个时期和同一领域的社会学研究分道扬镳的,无疑是文化在他们那儿被放在了研究的显著位置上。1970年代显示出的英国阶级形成过程的持久和变化、传统和转变的模式,都是在文化和政治术语中被认识的。但在这个城市里,汽车工人的政治兴趣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减弱为在长桥(Longbridge)的工厂车间中,或者从伯明翰郊区两边一直延伸到考文垂的配件工厂中,为工资讨价还价。所以那里几乎没有文化政治的踪影。但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寻找确实反映了一系列政治张力的文化形式。这种张力在充满活力的音乐亚文化中是很明显的,它们给被汽车、环形路、郊区的汽车工厂和出口道路层层覆盖的城市绘制了另一张地图。这个地图的作者是那些值得尊敬的默默不语的黑人和白人工人阶级的小孩,他们就

比我们这些研究生小几岁，他们一起在学校上学，开始感受到失业带来的阵阵冷风，他们努力想要创造出另一种生活。因此，问题在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渠道去了解比传统的左翼城市政治更重要的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的文化动因。

文化之屋

当我回顾以前写的这些文章时(参见第1章到第5章)，有两个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第一个时刻是我走进南伯明翰梅波尔(Maypole)地区的一个青年俱乐部，想要弄清14到15岁的工人阶级女孩是如何看待她们成长的世界以及她们的未来的。那是1975年的秋天，我当时已经怀孕近五个月了，所以我知道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做这个研究。我记得大多数情况下，这项研究是一段漫长的停滞时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也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和我交谈。每次我和各种各样的女孩们活泼愉快地相互交流之后，都有一段更长的时间，我宁愿做任何事也不愿意到处晃来晃去，自己觉得很尴尬，和人交谈显得过于急切。在这个没有被严格定义的研究领域，我几乎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总的来说，这个研究不算是民族志研究，也不是对参与者的观察研究。我能够解释为什么使用这些方法去研究年轻女孩，比男性研究者对男孩们做同样的研究更加困难。女孩们的世界是多疑的，越是靠近包括她们的“卧室文化”在内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行为，这个世界越是难以被渗透。

但是我不打算消失在这个领域中，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把我拜访过几次的青年俱乐部和附近的学校看做是人类学研究的领域。我想要得到的是一幅年轻女性如何把自己视为女人的图画。所以我感兴趣的是她们对教育、工作和职业、家庭生活、家务琐事以及必然包括的对性的看法。我记得有几次这个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像在自动写作，融合成一个整体。年轻女性突然间没什么明显的理由就坐下来

开始无止境地絮絮叨叨地讲述关于男孩和性的看法,关于她们如何地讨厌男孩看她们、谈论她们和对待她们的方式,这通常都归功于幸运。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一种潜伏着的愤怒,她们感到很无聊,很厌倦,她们没有办法到城里去,没有钱在市中心的商店里消费。在很多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不受欢迎的侵略者,同样受到她们的“逗弄”和轻微的冒犯。我坚持下来了,遇到了一些愉快的时刻,而且亲眼看见了她们享受音乐、舞蹈的愉快时刻,感受到她们之间的友情的力量。

第二个时刻可以被看做是这些文章的背景,当时我到伯明翰的星俱乐部共产党中心(Star Club Communist Party Centre)去看一个叫做互惠生(Au Pairs)的乐队的首次演出。距第一个时刻已经过了4年,也就是1979年,我当时偶尔担任《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杂志的自由记者,为当地的朋克乐队撰写评论。我从一个在CCCS做研究的朋友那儿听说互惠生是一个性感政治朋克乐队。互惠生乐队的主唱莱斯利(Lesley)和贝司手简(Jane)都穿着时髦的男性装束,一副阴沉的几乎马上要发怒的样子,她们完全不愿意遵从舞台上性感女性的套路。(当我第一次看到伊拉斯蒂卡(Elastica)和贾斯汀·弗里希曼(Justine Frischmann),还有她的贝司手1990年代早期的一首流行音乐电视时,我觉得她们肯定看过莱斯利和简的一些早期录影)。我给这个乐队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而且差不多和她们成为一辈子的朋友。

在互惠生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来自大学或是艺术学校的同好。几个月后我被邀请参加乐队在斯巴克希尔的公寓的派对。整个地方都被清空了,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音响装置,包括一套控音台,由乐队经理马丁(Martin)负责操作。马丁曾经是CCCS的一个学生,但是因为被卷入了文化政治而放弃了学业。音乐的作者都倾向于描述纯粹快感的时刻,但是这种经验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真正大音量的舞会。混杂的音乐从抽掉歌声的雷鬼音乐很顺畅地进行到纯粹的迪斯科,从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早期在迷幻疯克

(Funkadelic)乐队的作品到雅买加斯卡(Jamaican Ska),从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到性手枪乐队危险的大爆发。左翼政治和音乐带来的欢乐、音响系统、雷鬼音乐、时尚和舞蹈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交叉。从那时起我开始在晚上固定地参加中西部地区的各种演出和俱乐部,并且为他们撰写文章。白天我要做些教学工作并且照顾我的女儿,晚上我出去时就把她交给我的丈夫。这段时期常常陪我去听音乐的是摇滚乐评人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有时候我们一周出去两次甚至三次,在伯明翰的白铁听(Tin Can)等著名的俱乐部出现,看1981年REM的第一次巡演,或者看利兹艺术学校乐队的早期演出,包括四人组(Gang of Four)等乐队。其他时间我和互惠生乐队的成员一起穿过伯明翰到环形路另一边的圣城动物园(Holy City Zoo)俱乐部看德美友谊社(DAF)乐队、裂缝(the Slits)或者堕落(the Fall)乐队的演出,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在海格利(Hagley)街的朗姆跑步者(Rum Runner)俱乐部看德克西午夜狂奔者(Dexys Midnight Runners)和快乐分裂(Joy Division)两个乐队的同场演出。除了看像传声头像(Talking Heads)和B52s那类巡回乐队的演出,还有数量惊人的本地雷鬼乐队,以及经常和互惠生一起演出的特使(the Specials)和挑选者(the Selector)这样的双音乐队。

一天晚上,在美人鱼酒吧(Mermaid bar)跳了一晚上舞之后(跳的是闪光首领(Grandsmaster Flash)、马文盖伊(Marvyn Gay)、王子(Prince)乐队的曲子,我们围坐在沃里克(Warwick)路乐队的房子里,这儿已经变成了醉舟(bateau ivre),其中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女孩米歇尔(Michelle)问我是不是记得她是我几年前在梅波尔的青年俱乐部采访过的一个女学生。另外两个女孩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这个过程活灵活现地印证了克利福德(Clifford)的提议:所谓的“被调查者”其自身常常在发生变化,处在不断分离的过程中(Clifford,1992)。可能这些女孩几年前和我的谈话就是为了说明即将发生的分离过程。这三个女孩曾经是那种叽叽喳喳的女孩,怒气冲冲的,对男孩们不抱什么幻想。在这个事例中,朋克音乐的唯一真相就提供了一条

真实的道路：从学校和家庭通向几里以外的莫斯利的破破烂烂的波西米亚聚居地，通向充满了演出、酒精、毒品和各式各样的人的酒吧。

这三个女孩现在变得无所畏惧，信奉虚无主义，非常政治化。她们消费政治性的书籍（特别欣赏《消灭男性的社会宣言》），并且愤怒地抨击中产阶级的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的生活过得很舒服。她们和乐队一起旅行到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参与了“军队撤出北爱尔兰运动”。女同性恋主义很吸引她们，但是她们不喜欢激进的女权主义和分裂主义，她们也不喜欢女权主义指挥女人们应该怎么做的方式以及当时女权主义政治的反时尚风潮。她们参加示威游行，和警察发生冲突，在“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和反纳粹联盟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她们也消费了大量的毒品。我从来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她们看起来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and 吸食的数量，所以只有极少数的情况能看出她们在嗑药。她们也积极展开有关媒体和专家对吸毒者的偏见和误解的漫长辩论。她们很渴望吸毒能合法化。这三个女孩都极其有魅力，都是二手衣打扮的专家。她们在二手市场仔细筛选，带回大量 1950 年代的漂亮的棉布太阳裙，1960 年代的无腰线直筒连衣裙、钩编开襟羊毛衫、挺括的没有磨损的男士棉布衬衫，1950 年代以来时髦的深色男女式套装、粗花呢冬季外套，还有 1940 年代的天鹅绒和丝绸。这些都是仅仅几年之后将会给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iano）等时尚设计师提供灵感的样式。她们自己的形象都是仔细地 from 1940 年代的黑色电影和 1950 年代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挑选出来的，特别是电影《眩晕》中金·诺瓦克（Kim Novak）的造型。朱莉（Julie）也很喜欢比莉·哈勒黛（Billie Holiday）那种感性的忧郁的形象。

到那时为止，她们和包括马丁在内的两个男人一起住在沃里克路的破旧的短租房里面。有时候我会在接我女儿放学回家时顺便到她们家坐坐，喝杯茶。朱莉没有获得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s）就离开了学校，她会斜躺在沙发上看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的《什么是超现实主义？》，或者看让·谷克多（Jean Cocteau，法国艺术

家——译者注)的东西。思达(Sitara)会专注地看麦尔坎(Malcolm X,是美国民权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注)的传记。米歇尔则会讨论乐队下一只单曲的唱片封套设计。这座房子看起来也同样表达了这些年轻女性对超越和极端的渴望。地上散放着单曲唱片和黑胶密纹唱片,临时组装的架子上塞满了40年来的各种小摆设,橱柜上高高地堆着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墙上贴满了地图。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所有录像机的房子,她们买它是为了看各种政治组织的影片。书架几乎要被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拉康、菲利普·钱德勒(Philip Chandler)、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等人的书籍挤倒了。乐队有一些收入,那些不花在路上或者工作室里的时间就被用来聚在一起阅读、讨论,为乐队创作歌曲和艺术理念。他们主要受到让-吕克·戈达尔、瓦尔特·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的影响,当然还有鲍勃·马利。

他们如此为融政治与艺术于一体的艺术热望所驱使。从那时起,除了在一些艺术学校教书的时候,我再没有遇到过这样一群人。沃里克路的房子里摆满了关于利希司基(Lissitsky)、康定斯基和俄国构成主义派的著作,还有李·米勒(Lee Miller)和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拍摄的照片。互惠生创作的每一首歌都打上了关于艺术和形象、性和政治的思考和讨论的烙印。他们的专辑标题《与异性嬉戏》(*Playing With A Different Sex*)故意弄得很模糊,乐队中的两个男人很高兴地发现自己在强壮的女人面前黯然失色,而后渐渐缩到背景中去了。唱片封面是伊芙·阿诺德拍摄的富有冲击力的照片,拍的是战斗中的两个中国女战士。其理念在于创立一个乐队,给传统的左翼女权主义政治注入愉悦、神秘和色情因素。现在我的回忆中似乎是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夜晚”。一天晚上美国摇滚乐评人格赖尔·马库斯(Greil Marcus)来找莱斯利(Lesley)。当乐队在美国巡演时,他写了一篇非常热情的评论,他对互惠生把尖锐的左翼政治与性和愉悦相结合的想法非常着迷(Marcus, 1993)。但是这次拜访进行得并不顺利。莱斯利感到很紧张并且喝了很多酒。格赖尔开始谈论自己的妻子多么地好,自己在加利福尼亚的家多么地漂亮,这让其他

人觉得很恼火，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

形成对照的是，在其他的夜晚，不经意间听到的地球风与火乐队（Earth Wind and Fire）、莎丽玛乐队（Shalimar）、灭绝乐队（Defunct）、克莉丝蒂娜（Christina）、是不是乐队（Was Not Was），还有糖山帮乐队（Sugarhill Gang）早期的音乐，似乎也让我们非常愉快。但是这种和音乐的亲密接触，有时需要在深夜里，行走在从斯巴克希尔回到塞利公园的路上，或者要沿着 M45 公路从考文垂回到伯明翰，这对工作和谋生来说，是真实存在的一系列巨大风险。我们这些获得了学位和研究生资格的人，逐渐侧身回到了高等学府、社会服务、独立电影和电视制作的世界中。而对于梅波尔的这三个女孩来说，这些选择都没有她们的份。像很多类似的故事一样，这个乐队最终因为钱和毒品带来的相互争执和指责而解散了。当其他人各行其是，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时，这三个女孩：朱莉、米歇尔和思达仍然对彼此非常忠诚。

与米歇尔的见面，1999

接下来是经过整理的我在 1999 年和米歇尔的一段谈话录音。我有将近 14 年没有见到她了，但是我知道她搬到伦敦去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我们先见面重新建立了联系，几周后才做了这次访谈。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当米歇尔如此兴奋地和我谈起过去青年俱乐部里的事情时，我意识到她肯定已经准备好把传统的女性特质抛到脑后，同样，我自身在那时对她那种音乐休闲亚文化的沉迷，几年以后再去看来，对我来说也标志着一个起点。在我生命的那个时期，当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没有办法全面地参加大学里的智性生活时，我肯定下了某种决心让自己参加这种形式的文化政治。简短地说，在那时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权主义学者。但是我能够写些短小的文章，包括涉及很广泛话题的新闻报道，这些